“AI公务员”上岗、12345热线接入DeepSeek大模型……

人工智能引发数字治理变革

□ 唐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开发适于政府服务与决策的人工智能平台,研制面向开放环境的决策引擎,在复杂社会问题研判、政策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重大战略决策方面推广应用。”

2025年初,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迎来新一轮热潮——深圳福田70名“AI公务员”正式上岗,辽宁、广东梅州、江西南昌等地12345热线全面接入DeepSeek大模型,江苏无锡、山东临沂等城市也相继推进政务大模型的本地化部署。这场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数字治理变革,正在推动政府的治理效能发生转变,但在技术赋能的背后也潜藏着诸多风险与治理挑战,亟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治理的底层逻辑

在数智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已逐渐成为推动数字治理变革的关键动力。依托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人工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党政机关政务服务的运作模式,助力政务服务实现高效化与智能化升级。

推动政务流程转型,实现行政效率跃升。人工智能在材料预审、政务问答、公文处理等流程性、重复性工作中展现出显著优势,其标准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为行政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可能。据媒体报道,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支持下,深圳福田政府的公文处理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公文格式修正准确率超95%,审核时间缩短90%,错误率控制在5%以内。随着在行政领域的逐步应用,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与公职人员共同承担起日常事务处理的重要职能,推动行政工作向更高效率迈进。

构建政务知识体系,提供精准政务服务。传统政务服务主要依靠公职人员长期积累的个人经验,但这些经验往往分散在不同岗位,缺乏系统整合。而人工智能系统则通过整合碎片化的个人经验,构建起跨部门、跨领域的系统知识库,将大量原本依赖个人主观判断的政务服务过程转化为基于标准化知识体系的服务模式,从而提高了服务的质量。例如,北京的智能政务问答知识中枢通过对具体业务场景、部门及政策文件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度学习,构建起高质量知识库和智能问答功能,实现精准政务服务的提供。

重塑政府组织架构,引领治理范式革新。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入应用正在重塑政府的组织架构。政府人力资源配置面临快速的结构性调整,传统窗口服务、巡查监测等岗位需求呈现收缩态势,而新型专业技术岗位需求则显著增长。人工智能系统的持续发展也为治理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基础。基于历史数据学习形成的智能预判机制,正引领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型,实现服务前瞻性和主动性的提升。例如,山东临沂推行的企业精准“画像”人工智能系统,通过融合应用政府公共数据,精准识别并筛选出行业优秀企业向金融机构推送,目前已助力企业融资增信超过33亿元。

技术赋能背后的潜在风险与治理挑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治理领域的深入应用,其在技术赋能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治理挑战。不仅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存在固有问题和自身缺陷,技术的实际应用还进一步催生了更为复杂的系统性风险。

第一,信息需求激增引发行政负担加剧和信息安全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有效提升了信息收集整合、加工处理和分析研判的速度,但也可能造成政府部门信息需求的迅速增长。将信息收集规模简单等同于数字治理能力,错误地认为“信息越多越好、越全越好”,进而盲目扩大收集范围,政府可能陷入“信息饥渴症”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重复且不必要的信息收集会显著增加基层行政负担,导致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更值得警惕的是,信息安全防护体系的建设速度滞后于信息收集速度,容易引发信息安全风险。

第二,训练数据缺失引发算法可靠性风险。训练数据是影响人工智能认知水平的关键要素,在行政领域却可能面临“结构性缺失”的难题。大量纸质历史文件无法及时完成数字化,导致“数据断档”问题凸显;上下级、同级之间存在的部门壁垒导致政务数据无法有效互通共享,造成“数据孤岛”现象。此外,众多重要文件受保密要求和权限设置的限制,导致人工智能难以获取全面完整的训练数据,影响了算法的可靠性。训练数据的缺失还易造成算法偏见。这些缺陷可能会严重影响公共服务的质量。

第三,技术过度依赖引发对公共价值的侵蚀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将复杂的社会治理场景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模型,实现了社会问题简化与行政效率提升。然而,这一过程也可能会削弱在治理实践中难以被量化的另一重要维度——公平正义与情感温度,引发效率优先与公共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技术主导的治理框架中,过度追求“最优解决方案”容易忽略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淡化社会关系中的人文关怀。当流程化、标准化的官方答复无法有效回应个性化的现实困境和情感诉求时,可能会对未来的干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构建数字治理新范式的实践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需从多个维度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实践举措,以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效能,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数字治理新范式,为实现数字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确立双轨并行的治理导向。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制订针对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治理的新一轮国家战略规划,确立“技术赋能”与“制度约束”双轨并行的治理导向。明确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在行政领域的应用边界,制定人工智能应用的“三张清单”——职能清单、限制清单与协同清单,将其应用范围限定于事务工作辅助,在重大政策制定等核心政府职能方面审慎控制算法的介入程度,避免技术错用滥用引发的决策失误和技术依赖问题,确保技术应用与治理目标相协调。

二是规范信息收集,强化信息安全防护体系。构建精准评估机制和安全防护体系,防范因信息需求激增造成的行政负担加剧和信息安全风险。首先,建立基于实际治理需求的信息收集评估机制,动态界定信息收集的边界和优先级,减少重复性、低价值信息收集。其次,构建与信息收集能力相匹配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更为关键的是,加强公职人员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深化人机协同能力建设,着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政务流程又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复合型干部队伍。

三是推进数据治理,建立多维度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建立数据治理的多维度协同机制,通过提供完整全面的训练数据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首先,加快推进历史文件的数字化进程,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非结构化数据清洗和标注,解决“数据断档”问题。其次,搭建政务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推动上下级、同级部门之间的数据流通,打破“数据孤岛”。此外,建立算法持续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和修正算法偏见问题,同时制订完善的风险预警与应对预案,快速识别并处理可能存在的人工智能系统问题隐患。

四是加强人文关怀,构建有温度的数字治理生态。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数字治理应打破由技术主导的单一效率思维,将公共价值与人文关怀融入新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政府应进一步巩固“服务者”的核心角色定位,在借助人工智能系统重塑政务流程时需着重关注服务场景中的群众需求,重视情感在治理中的纽带作用,有效预防技术冷漠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针对部分特殊群体,应主动保留传统线下服务渠道,并通过线上线下有机联动,降低技术使用门槛,以确保数字治理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综上所述,在本次数智化转型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既是重塑政府治理的“加速器”,也是检验治理智慧的“试金石”。唯有坚持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并重、效率提升与公平保障兼顾,方能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创新之路。未来,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伦理规范等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地,政务人工智能应用必将朝着更安全、可信、包容的方向演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转自《大众日报》

构建县域基层治理新格局的实践路径探索

□ 张全刚

截至2025年3月,全国城镇化率突破68%,但县域仍承载着5.6亿常住人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中国建设的双重驱动,县域基层治理面临“流动社会”与“数字鸿沟”交织的复杂挑战。探索以制度创新、技术赋能、文化重构为核心的县域基层治理升级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县域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

治理对象的复杂性加剧。一是人口结构剧变。县域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6.3%,留守儿童超1200万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突破1.2亿人。二是利益诉求分化。土地流转纠纷、集体资产分配、环境污染维权等新型矛盾占比升至58%。三是风险传导加速。县域2024年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72%源于基层治理响应滞后。

传统治理模式的三重失灵。一是行政主导的效能衰减。科层制响应速度与群众期待存在代差,县域政务热线平均处理周期达5.3天。二是社会参与的机制梗阻。社会组织人均服务半径仅为城市的1/5,志愿者资源利用率不足40% 。三是技术应用的适配困境。县域数字化平台重复建设率达63%,30%的“智慧社区”终端沦为“数字展板”。

实践路径创新

党建引领。重构组织动员体系。一是建立三级联动机制,建立“县委社会工作部—镇街治理联合体—村社党群服务中心”垂直架构,将党组织嵌入住宅小区业委会。二是加强先锋队伍培育,实施“头雁领航工程”,选拔乡贤能人进入村“两委”班子,培育“党员网格员”。三是建设政社协同平台,创建“红色物业联盟”,整合住建、城管、物业三方资源,提升物业纠纷化解率,同时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整合土地资源,发展智慧农业,带动村民年均收入增加、集体经济增长。

数字赋能。一是建设智慧治理中枢。实施数据融合工程,构建县域“数字孪生底座”,归集各类数据信息,实现诸如应急管理等场景“一图统管”。二是建立智能响应系统。开发“民声直达”App,集成诉求上报、在线调解、积分兑换等功能,实现日均处理事项大幅提升。三是构建风险预警网络。运用AI算法分析12345热线数据,提前识别拆迁安置、劳资纠纷等风险点,提升预警准确率。

制度创新。一是完善长效保障机制。丰富柔性治理工具包,制定《村级协商议事规程》,创设“祠堂说事厅”“田间调解站”等本土化协商载体。二是建立信用激励机制。建立志愿服务积分银行,积分可兑换体检套餐、农技培训等社会资源。三是构建法治保障体系。组建由法官、律师、乡贤组成的“流动法治服务队”,开展村规民约合法性审查。

文化浸润。一是实施德治教化工程。建设“家风家训馆”,开展“诚信商户”“最美庭院”评选。二是文化记忆重构。整理红色遗址、传统技艺等资源,出版《县域治理百例故事》等。三是文化治理。通过举办“饺子宴”“乡村夜话”、评比“好儿媳”“好邻居”等活动,关爱空巢老人,弘扬传统孝善、和谐文化,完善乡村治理。

资源整合。一是加强乡贤治理工程。建立三级乡贤数据库,吸纳知名企业家、技术专家成立顾问团,建设民生项目。二是加强社会组织赋能。设立公益创投基金,培育“调解队”“新业态权益会”等特色组织。三是企业责任转化。推行“社区合伙人”制度,引导商超、药店提供歇脚饮水、应急充电等微服务。

深化改革的关键突破点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建立县域治理资源图谱。绘制人力、财力、数据、设施四张清单,实现跨部门智能调度。二是创新社会资本引入。比如发行全国“社会治理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智慧社区建设。三是培育本土化专业队伍。与高等职业院校合作,开设“乡村治理师”等定向培养班,每年定向输送人才。

应对数字化转型挑战。一是开发适老化服务界面。在政务App增设语音导航、视频帮办等功能模块。二是建设数字素养教育基地。在社区学校开办“跨越数字鸿沟”培训班。三是建立数据安全防火墙。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敏感信息脱敏处理,通过国家认证。

县域基层治理新格局的构建,实质是治理现代化的本地化实践。通过党组织搭台、多元主体唱戏、数字技术赋能、制度文化塑形的四维驱动,形成规模治理与精准治理相统一的解决方案。未来需在培育社会企业、建立县域治理智库、完善政社协同立法等领域持续突破,让基层治理既有制度刚性,更显人性温度。

(作者单位:单县县委社会工作部)

单县羊肉汤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 黄国震

作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单县羊肉汤承载着300余年的饮食文化基因。当前,该产业面临着品牌价值分散、标准化程度不足、产业链条短等发展瓶颈。本文从产业生态重构视角切入,提出“文化赋能+科技驱动+市场突围”的三维发展模型,为区域特色餐饮产业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产业现状与核心优势分析

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独特竞争力。单县羊肉汤始创于清嘉庆年间,凭借“色白似奶、水脂交融”的独特工艺入选《中华名食谱》。2023年行业统计显示,全县羊肉汤门店超2000家,年产值突破18亿元,直接从业者达3.2万人,已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的初级产业链。

品质认证体系奠定发展基础。2024年《单县羊肉汤团体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三必须”(必须本地青山羊、必须传统吊汤工艺、必须4小时鲜汤供应)要求。地理标志认证产品市场溢价率达35%,冷链配送范围已覆盖华北地区主要城市。

制约产业升级的四大矛盾

品牌分散化与规模效应的冲突。当前存在“朱氏”“三义春”等20余个地方品牌,但缺乏统领性IP。市场调查显示,外地消费者对单县羊肉汤的品牌认知度仅为41%,显著低于兰州牛肉面(78%)、柳州螺蛳粉(92%)等同类型产品。

传统工艺与工业化生产的矛盾。手工熬制导致的产能限制明显,单店日均供应量不足200碗。实验室数据显示,传统工艺的营养留存率虽高达82%,但存在出品稳定性差、菌落控制难度大等技术痛点。

区域依赖与市场拓展的矛盾。2024年销售数据显示,省内消费占比仍达67%,江浙沪市场渗透率不足12%。冷链物流成本占终端售价的18%,制约跨区域扩张。

文化价值与商业转化的断层。非遗技艺传承人仅存7位,年轻从业者占比不足15%。文旅融合项目停留在“参观作坊+品尝试吃”的初级阶段,未能形成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

做大做强的战略路径

实施品牌矩阵战略。一是构建“1+N”品牌体系。创建“单县羊肉汤”区域公共品牌,整合中小品牌,形成细分市场产品线。借鉴“沙县小吃”模式,建立统一的视觉识别系统与质量认证体系。二是打造文化超级符号。开发“汤祖祭典”文化IP,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复原清嘉庆年间的制汤场景。与故宫文创合作,推出联名款餐具礼盒,实现饮食文化符号的年轻化表达。

推进产业链垂直整合。一是上游养殖端升级。建立青山羊种质资源库,运用基因测序技术优化种群结构。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养殖模式,力争2026年实现青山羊存栏量50万只,优质肉源自给率达90%。二是中游生产智能化改造。研发第六代智能熬汤设备,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控pH值、脂肪粒径等18项关键指标。建设中央厨房体系,使预包装产品保质期从7天延长至45天。三是下游渠道立体化布局。开设“城市体验店+社区智能柜+线上云厨房”三级销售网络。开发“鲜汤自提站”,实现“线上下单—冷链配送—家庭加热”的消费闭环。

构建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一是建立产业研究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中华汤品研究中心”,重点攻关风味物质锁定、胶原蛋白提取等关键技术。2024年已申请“超声波辅助乳化”等专利3项。二是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开发“羊肉汤主题观光工厂”,设置VR熬汤体验区、分子料理品鉴区。策划“二十四节气汤谱”,将冬至喝汤习俗升级为养生文化IP。三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搭建产业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门店运营数据。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原料溯源,消费者扫码可查看羊肉的养殖档案与检验报告。

政策支持体系建议

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对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贴息补助。实施“百城万店”计划,对省外门店给予装修补贴。建立产业人才学院,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体系,输送专业人才。

单县羊肉汤产业的升级本质是传统饮食文化的现代表达,要通过构建“文化—科技—市场”的协同创新机制进一步做大做强,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可复制的特色产业样本。

(作者单位:单县畜牧服务中心)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研究

——以菏泽市为例

□ 周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兼具促进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双重功能,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保障安排。近年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任务。菏泽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千万人口大市,高度重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一、菏泽市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做法和成就

(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体系渐趋完善

按照国务院关于“十四五”时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菏泽市政府出台了《菏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着教育、就业、社会保险等关键领域提出要求和目标,并列出一系列公共服务重点工程。2022年,出台《菏泽市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规划(至2035年)》,提出到2025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7%的目标,并明确指出推进城乡发展均衡化。

(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持续增加

菏泽市注重强化财力保障,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加大公共服务项目资金投入力度,通过定向财政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及补贴政策,覆盖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消费促进等多个领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稳步增长。2024年,菏泽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8%。

(三)重要民生领域发展成效明显

基本公共服务持续优化。去年,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城镇就业7万人,返乡创业就业4万人。教育事业取得新进展,新建改扩建中小学30所,新增学位3.7万个。启动实施新一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质提效三年行动,建成县域医共体14个、“名医基层工作站”165个,改造提升村卫生室920个。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乡镇综合文化站全部达到三级站以上标准,培育非遗工坊52家,全民健身扎实开展,各类体育场地达到1.9万个。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医疗等惠民保险扩面提质,9类困难群众救助标准持续提高。

二、菏泽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菏泽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

菏泽是人口大市、经济弱市,部分民生领域的历史欠账较多,人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等。从教育领域看,城乡之间在财政投入、师资水平、教学条件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卫生健康领域看,县级医院专科能力不强,人才短缺,农村医疗卫生资源质量较低,农村医疗人员“引不来、留不住”现象普遍存在。从基本社会保障领域看,虽然初步建立了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城乡之间在保障的覆盖面、保障水平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我们正处于大数据时代,但菏泽市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乡镇平台服务内容少,能办理的业务少。

(二)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因

一是人均生产总值不高。近些年菏泽经济发展迅速,2024年以4802.58亿元的GDP稳居山东省第八位,增速达到7.57%,但人均GDP只有55614元,处在山东省倒数第二位,人均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较低,这就限制了人均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二是财政支持力度不足。财政支持力度不够,财权事权不匹配。三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重城轻乡”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四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错位。政府难以准确识别和区分城乡间不同群体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层次化、多样化的需求差异,同时农村居民受限于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于自身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知如何表达,难以形成有力的声音。

三、菏泽市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

(一)持续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一是要做大做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块蛋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推动城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好物质基础。二是要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将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引入其中,丰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二)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一是要推动城乡基础教育资源优质均衡配置,发挥优质品牌学校的示范辐射作用,利用信息技术推动优质资源城乡共享。二是打造城乡医疗健康服务共同体,推动城市内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地区扩容下沉。三要健全城乡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协同发展体系,深入实施各项文化惠民活动,着力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贯彻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四要建立城乡社会服务协同发展体系,构建城乡协同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打造覆盖市、县、乡、村的儿童福利服务设施网络,推进城乡救助保障体系一体化。五要建立城乡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协同发展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创业政策。六要建立城乡基本社会保险共享协调发展体系。

(三)健全完善相关财政保障制度

一要加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相应支出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确保财政支持力度不减、总量增加。二要科学划分政府间事权与财权,以公共服务的层次性为依据,进一步理顺市、县(区)的事权与财权的关系。三要建立均等化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要进一步拓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融资渠道,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服务供给体系,提升服务质量。

(四)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配套机制

一要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以法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完善法律援助综合服务平台和便民窗口、法律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特殊人群的法律援助。二要完善农村居民的需求表达机制,培养他们的民主权利意识,畅通农村居民利益传达渠道。三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数据互通共享机制,不断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协同化、智能化、均衡化。

(作者单位:中共菏泽市委党校)

乐见招才引智亮新招

□ 熊丽

近年来,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备受关注,今年多个一线城市也纷纷推出新政策。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针对应届毕业生推出“求职7日免费住宿、实习3月免费短租、就业3年优惠长租”等阶梯式安居体系,这在北京市尚属首次。深圳宣布把为来求职的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的免费住宿天数从7天延长到15天。

新一轮引才竞争有哪些不同?

一是政策更懂年轻人。从面试路费到过渡住宿,从创业场地到科研配套,政策覆盖求职创业全流程,用真金白银减轻年轻人的就业创业成本,让他们能“轻装上阵”。

二是竞争逻辑在升级。如果说过去更多是“拼补贴”“比户口”,如今则更强调“拼环境”“筑生态”,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创新创造、成长成才的发展空间,让他们能大展拳脚。

三是目标定位更清晰。从“抢人”方向看,更侧重于瞄准产业实际和未来发展方向,面向国内外引进科技创新人才。比如,广东“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首期募集的60多万个优质岗位中,半导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岗位占比超七成。

加快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是新一轮引才竞争背后的重要逻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进入活跃期。我国经济正从过去依赖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加速向“人才红利”“创新红利”驱动转型,数智融合、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成为新引擎。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引才竞争表面上看是人才政策之争,实际上是创新生态之争,更是未来发展竞争力之争。谁能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上先走一步,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经济大省在创新资源、产业基础、市场规模、开放程度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加大对创新人才的招引力度,是自身发展所需,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热潮之下需存冷思。要看到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同,不能盲目攀比,而是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和发展需求,差异化地引进人才,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形成合力。现实中,部分城市还存在“重引进轻培育”倾向。人才引进切莫“一引了之”。在“留得住”“用得好”上多下功夫,才能让他们真正安心乐业,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